

字秀一笔妙趣生

□沈成武



中国的方块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的诞生，是一件“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惊天动地的大事。汉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数千年来一脉相承，所以，今天的人们仍读懂三千年前的文字，这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同时，在数千年的文字演变中，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文字现象，即笔画的增减。除了封建社会的避讳外，一些增减笔画却有着出人意料的效果，体现了国人的妙趣奇思。

在犁桥水镇数以千计的老旧三雕中，也有一些增减笔画的趣“字”，读之令人逸兴遄飞、遐想无限。方塘北侧的独立石雕群内，有一方汉白玉材质的“土地之神”柱碑。有意思的是“土”字的中间多了一个“点”。“土”字本身在中国文化中就有深厚含义：五行之土，居中，生养万物，有厚德之誉。而土地神则是地方保护神，掌管一方水土、家宅平安、农事收成。古代“社”即土地神，“稷”为谷神，“社稷”合称，借指国家。土地神源于古人对土地的崇拜。明代因明太祖朱元璋出生于土地庙的历史渊源，形成遍布城乡的土地庙体系。这种民间信仰极为普遍，是广为敬奉的神灵之一。

在汉字书法中，“点”是最具表现力的笔画之一，常用来表示“灵光”“神采”“生机”。在“土”字旁加一点，寓意“土地有灵”“土能生万物”“土地之神有灵性”。这与“土地之神”的职能高度契合——土地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孕育生命、承载神灵的灵性空间。这一“点”，还会使人联想到“雨点”落于土上。暗喻“天降甘霖，润泽大地”，强化了土地神“护佑生养”的职能。现存最早的《铜陵县志》，就有关于“土神庙”的记载（“丁村湖在县东十里，湖滨有土神庙”），反映出百姓对土地的珍视，土地是生生所依，有了土地就有未来，希望土地多一点，便是百姓最朴素的愿望。

犁桥水镇有二十多根“泰山石敢当”，居然近一半的“泰山石敢当”的“石”字“口”上也多了一点。这些“泰山石敢当”有阴刻、有双勾，材质有砂岩、花岗岩、石灰岩，取自地域也不尽同，但是，都存在着多一“点”现象，这绝对不是雕刻者的偶尔为之。

“泰山石敢当”源于上古山岳崇拜，盛行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是中国民间最广泛流传的镇宅信仰之一。其核心功能是禁压不祥。在民间信仰或道教符篆中，有时会在文字旁加“点”“圈”“钩”等符号，作为通神、辟邪、加持的标记。在“石”字“口”上加一点，是一种“神符化”处理，意为此石已被“点化”“激活”或“封印”了神力，成为有灵之物。此一“点”，无言的石头不再普通，而是被赋予了“神性”，是“泰山石敢当”力量的来源——一点成神，具有驱邪、镇煞、保平安的神圣功能。

“秀含万有”是犁桥水镇300余块石匾额中的一块（见下图），意为秀丽的景致中蕴含着世间万物。其中的“有”字上面多了一横，它的诠释可不仅仅指“秀色”多一些。

“有”字的字形结构，上部是“ナ”（手形），下部是“月”（肉形），本义为“手持肉食”，引申为“拥有”。从视觉美学上看，“有”字上加一笔，使得字形更“满”、更“重”，形成一种“上盖下承”的平衡感，避免了字形过于瘦削或单薄，符合中国传统“肥瘦相宜、丰腴为美”的审美标准。从哲学层面分析，“有”字最上方的这

一横，如同苍穹、屋顶或天穹，覆盖在“有”字之上，象征着“有”的境界极高，达到了“顶天立地”的高度。它不再仅仅是物质的“拥有”，而是精神的“丰盈”与“包罗万象”。同时，也是为了配合“万有”这个宏大的概念。

犁桥水镇石雕中的字不仅仅有增笔，也有减笔。“五松山下”一副对联：“来寻静院叩棋声，远避嚣尘烦意事。”意为闹中求静，俗世避尘。这“烦”的最后一点不知所踪。当然，这“烦”字中省略的“点”，绝非笔误或败笔，恰恰是中国传统书法与文人艺术中一种极为高妙的“意趣”和“匠心”。

“烦”字的繁体“煩”，左是“火”，象征焦灼、燥热的心绪。右下角的“页”部，最后一点在书法中常被视为一个“顿挫”或“结点”。中国书法艺术讲究“计白当黑”“虚实相生”。这个“缺笔”的处理，在视觉上仿佛将这个字承载的“重量”或“淤塞”给卸掉了一角。一处小小的“空白”，可以理解为烦恼被驱散，是心境由“满”到“空”，由“燥”到“静”的转换痕迹，也是传统书法“意到笔不到”的至高境界。同时，这一“点”省略，字形显得更疏朗、透气，不那么“完满”和“沉重”，体现了书写者超然、戏谑的生活态度。象征着“减少一点烦恼”——连“烦”字本身都不完整了，何况人心中的烦扰呢？这是一种“字形即心象”的巧妙表达。与对联整体追求的“静”和“远避”的意境完美契合。

在华夏大地，类似增减之字，何其多也。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山东省济南名士刘廷桂在泰山石壁上题镌“虫二”二字，是“风月无边”的省写；山东省曲阜孔府正门上有这样一副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共老文章道德圣人家。”上联中的“富”字少上面一点，下联中的“章”字下面的一竖一直通到上面。意为“富贵无头”“文章通天”；“明孝陵”上面的“明”写成了“明”，其含义是“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势”，所以重“目”；康熙为杭州西湖书写的“花港观鱼”，繁体“鱼”字四点变三点，是因为“四点”具有火的含义，而康熙有好生之德，为了鱼免受火烤之痛苦，故意写成了三点水。还有著名“趵突泉”匾额，“突”字宝盖上面少了一点，而大明湖牌楼上的匾文和石碑上面，中间的“明”字都多了一横……

一点之加，宛如神来，熠熠生辉；一点之缺，云舒云卷。这一“点”，是民间信仰、书法艺术、文字文化三者交融的结晶，是“泰山石敢当”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它不仅丰富了字形的视觉美感，更升华了“秀含万有”这一短语的哲学与美学意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字以载道、文以传神”的深厚底蕴。这种写法体现了书写者或刻工的匠心独运，他们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字体，而是通过细微的改动，赋予文字独特的个性和生命力。这一点如同“画龙点睛”，让整个“有”字活了起来，有了生气和神韵。这正是民间石刻最迷人的地方——在规矩之中见变化，在笔画之间藏智慧。书法构思可谓精深独特，别出心裁。增加了品鉴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犁桥水镇的这些神奇的文字，如果不是妙手偶得，确实是慧眼识宝。它们散布在这座露天石雕博物馆的角角落落里，若发现了，它像一个哑谜，一个“彩蛋”，能看破便觉得乐趣无穷并会心一笑，便是知音，不会人宝山而空手归，发出“天下无马”之叹。



犁桥方塘北侧石匾的“秀含万有”的“有”字上面多了一“横”。



今年四月中旬的一天，听一位朋友说，铜陵有色土建老专家张德槽去世了。

我开始一愣，接着连声说道：不会吧，不会吧。两个月前，也就是二月中旬，我按照春节、重阳节问候张总的习惯，拨通他的电话。交谈中，他依然思路敏捷，声音洪亮。因为正值春节，他的话中还略带几分喜悦和轻快。和往常一样，张老又畅谈起他的一天生活：早起、早餐是自制的赤豆八宝粥，然后去公园漫步……交谈中，能感受到他依然生活规律，情绪饱满，身体健康。他还问及同行老同志们健康状况，我则根据了解一一汇报。

见我对朋友的消息不大相信，他补充道，《铜陵有色报》都登了，你上网查查。

我急忙上网查看，几个网站上都有张老去世的讣文。都有相同的关键词：张德槽、河南郑州人、有色基建处工程师、有色总工程师、2026年3月16日逝世、享年96岁。

唉，老人家真的走了！透过湿润的眼眶，我看到的却是年轻的张德槽老师。

那是1962年的深秋，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铜陵有色基建处设计科，科长把我交给张德槽工程师。从此，张工成

追忆恩师张德槽

□叶葆菁

为我专业技术的领路人，也就是师傅。张德槽中等身材，衣着朴素，气质亲和，说一口儿化韵味的河南普通话，声音洪亮，笑容可掬。第一次见面就没有那种初识的陌生感。那时的张工刚过30，比我大7岁，他精于施工，擅长设计，有着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我心中暗想，在他身边工作，一定能学得很多知识和技能。

张工给我安排的第一项任务是选厂的一个球磨机基础设计。他把球磨机的资料交给我，还给了我一本《动力机器基础设计指南》，叫我列出设计步骤，计算出结果并绘出施工图。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好在我那时年轻，悟性也算正常，加上小心翼翼地作业，计算书与所绘图纸都得到张工的认可。这时张工拿出与这台球磨机型号很接近的基础设计图说，其实你要做的这个设计只要在这张图纸上改几个数字就行了。我让你从头做一遍，是让你经历设计全过程。初做设计必须按步骤从头做起，不能抄近路。我被老师的良苦用心感动着，决心好好干，不给师傅丢脸。

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张工一边指导一边观察，通过几个项目的设计，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1963年夏天，铜陵有色公司决定在五公里建办公大楼。设计组由张工挂帅。

方案确定之后，张工大胆安排我负责结构设计。其中有两处难度较大：一

是有几间进深为5.4米的小型空间。如果采用普通梁板结构，梁的高度要45厘米，而且一个办公室头上有一根大梁压着，总觉得很不舒服，有压抑感；如果采用板结构，板厚达13到14厘米，不仅自重，而且浪费材料。于是我尝试用密肋楼盖设计，梁高由45厘米降到25厘米，板也只用了5厘米厚，大大节约了成本，这个方案得到张工的支持，决定采用。施工后效果很好，也很美观。再一个就是公司领导要求设计一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大型会议室，于是建筑设计就在主楼四层的东侧设了一个14米乘18米的大会议室。既然是会议室，中间就不能有柱子，如果采用主次梁结构，主梁的高度要达到1.2米，不仅太占空间，而且还要把整个楼层的高度往上提。经过反复思考，我按双重井式楼盖设计。手册上没有这种结构的计算公式。我必须在计算之前，建立一个计算公式，并且这个公式既要合理，又要经济，更要安全。按照我综合各种因素建立起来的公式算下来，这个会议室的梁高只有65厘米，比较薄，空间就大了很多。这个方案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么大的跨度，设这么薄的梁，是不是安全？这时，又是张工支持了我，他仔细检查了我的计算书和图纸，确信我的设计是安全可靠的，最终在计算书和图纸上都签了字。因为当时我还是入职不到一年、尚未转

正的设计人员，张工审核通过并签了字是要担责的。他的信任让我十分感动，信心也更足了。实践证明，经过60年的使用，这套计算方法是正确的。张工的签字也是正确的。好师傅不止于手把手地传授，事中放手信任，事后认真审核，不失为一种高级指导，令人敬佩。对于我而言，被信任更增加了我的事业责任心。

基于这项大胆而成功的设计，我被评为了“五好青年”，参加了铜陵有色公司的“群英会”。我说，是张工扶持了我，托举了我。直到2012年，在铜陵学院为我举办的从业50周年座谈会上，张老提及此事时，仍不提自己的大胆决策和精心指导，令我敬佩与感激，并当场起立向他鞠躬致谢。做事严谨，做人低调，师风范铭记在我心间。

我是幸运的。幸有张工的指引，让我在专业的路上比较顺利地走过半个多世纪。但无论走多远，总是循着张德槽老师为我设置的路标前行。

张总五六十岁时，还负责组建了一个小型设计室。我的好几届学生曾入职他的门下。他除了伏案制图、审图，更多的精力是扶持他们成长。他们也不负师爷厚望，成长、成熟、成功，有的最后也成了总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恩师风，山高水长。作为铜陵基建行业的一代宗师，张德槽，将与城市同在。



湖光山色

李昊天 摄

“钱湾灯火”的信仰之光

——谨以此文纪念中共铜陵特支创建95周年

□詹敬鹏

士的生平事迹与文物遗存（如草鞋、煤油灯、长枪等）；“大事记”单元主要以编年体形式，梳理1919—1949年铜陵党组织发展的关键节点等。

驻足凝望“钱湾灯火”主题单元，我的思绪被村讲解员的解说拉回到95年前的钱湾村。1930年11月，原中国红军独立二师副师长凌霄来到铜陵，点燃了铜陵长江以南地区的革命星火。

凌霄，原籍池州贵池县里山乡凌家村人，1925年在芜湖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凌霄受党指派进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历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1928年，他回到贵池，创建了中共贵池特支。1930年2月，受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派遣，参与组织领导了潜山清水寨暴动，担任红军第一军中央独立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及一军团长等重要职务。暴动失利之后，他与刘中一、王子成等60多名党员，分散到皖南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1月，凌霄经贵池来到铜陵，秘密从事建党活动，落脚在太平钱家湾（今义安区西联镇钱湾村）章啸衡家中。章啸衡为人豪爽，仗义疏财，广结善交，家境较为宽裕。早年，章啸衡在芜湖赭山读书时，就结交过一些热血青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倾向革命。1927年章啸衡参加了北伐和东征讨蒋，被捕后经营

救回到家乡。凌霄的到来，使章啸衡看到了新的希望，激发出革命热情。他置生命安危于不顾，秘密将凌霄安置在家中，想方设法为凌霄建党活动提供方便，成为凌霄来铜陵之后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凌霄在章啸衡的积极配合下，在汀洲、犁桥（今义安区西联镇）一带宣传革命思想，陆续发展了沈默、郑启书、邵德元等人入党，并联系到1927年在武汉加入中共党组织，参加北伐战争后与党失去联系的谷捷臣，恢复了谷捷臣的组织关系。随着铜陵地区的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时机已成熟。

1931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农民大多已进入了梦乡，水乡村庄显得格外宁静。然而，在铜陵县太平钱湾村村头章啸衡家中的一间密室里，却洋溢着融融春意。凌霄、章啸衡等党员在钱湾村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景：“紫沙曙光”单元主要展示了在抗日战争时期，铜陵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及武装斗争相关史料；“英烈千秋”单元主要陈列了凌霄等革命烈

仰之光。中共铜陵特支的诞生，犹如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给在黑暗中摸索的铜陵人民指明了前进的航向。此后，大通、铁板洲、山坳汪村、钟鸣和金榔等地的党组织相继成立，革命火种燃遍了铜陵大地……从1931年初的寒凝大地，到1949年春的山花烂漫，整整18年，铜陵人民在铜陵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开展游击战争，前仆后继，浴血拼搏，坚持斗争。从1938年新四军进驻铜陵抗战开始，铜陵老区就是皖江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皖南事变中，铜陵党组织掩护突围新四军穿越封锁、渡过长江；在日伪重兵包围中，坚持武装斗争，并保证了江南地区和江北新四军七师联络畅通；在解放战争期间，铜陵党组织和地下工作者积极参与渡江侦察，完成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任务，为整个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铜陵便以“江南解放第一城”的赫赫勋业永载共和国的史册……

历史从未远去，钱湾的灯火依旧映照当下。我们追寻铜陵人民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从中汲取初生力量，将信仰之光转化为新时代砥砺前行、书写属于今天与未来的壮丽答卷。